

The dissemination of Prussian military thought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path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Xueyan Zh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Prussian military thought in late-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focusing on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institutional imitation to educational rationaliz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Prussian military thought in China extends beyond the military domain: it facilitate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through education. From the Hubei Military Academy to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the Prussian educational model provided a templat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 The "Germanization" of military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was, therefore, not a mere imitation but an early experiment in educational rationalization—revealing the creative agency of a non-Western society in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Keywords

Prussian military thought; Zhang Zhidong; knowledge transf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disciplinary rationality; cultural re-contextualization

普鲁士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知识迁移与制度教育化的路径研究

张雪岩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北京 100000

摘要

本研究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核心议题，探讨其在跨文化知识迁移中的“教育化”路径与制度化机制。研究认为，普鲁士军事思想在中国的意义超越了军事领域，它通过教育理性化实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从湖北武备学堂到黄埔军校，德式军学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教育的理性化模板，体现出一种以教育为载体的制度文明移植。本文由此指出，晚清的“德化军学”并非简单模仿，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中最早的理性化实验，揭示了非西方社会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再创造能力。

关键词

普鲁士军事思想；张之洞；知识迁移；教育制度化；纪律理性；文化再语境化

1 引言：从“制度移植”到“知识教育化”

普鲁士军制以严密的组织结构、参谋体系与纪律教育著称，被视为“国家理性化”与“教育制度化”的典范。这种制度化并非单纯军事技术的优越性，而是一整套“将士兵塑造成为有思维与服从能力之人”的教育哲学。正因如此，它在晚清军事改革的知识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张之洞（1837–1909）是这一知识转译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将德式军制引入湖北新军，更在武备学堂中系统化了普鲁士教育体系，使军事思想第一次在中国被制度化地教授与传播。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必以法度为本。”这里的“法度”，不仅指国家法令，更暗示一种普鲁士式的教育理性——以纪律为核心、以科学为方法、以制度为保障。

因此，本文并不将普鲁士军事思想视作单纯的“外来技术”，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教育化过程加以考察。换言之，本文探讨的并非“如何模仿德制”，而是“知识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被教育化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

2 传播路径与制度化过程

普鲁士军事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并非单线传入，而是经由顾问、译著与制度仿制三条路径同时展开。这种“多层迁移”使得普鲁士军制不止作为制度样本存在，更成为一种被嵌入中国教育语境的思想形态。

2.1 德籍教习与留学生：制度经验的直接传授

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1896–1909），德籍军官的聘用达到高峰。根据《湖广总督衙门档案·德籍教习聘任册》

记载,至1905年止,湖北新军共有德籍教官12人,其中包括战术、测绘、工兵、火炮等专门科目教官。^[1]这些教官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 Erich von Falkenhayn (法金汉),其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总参谋长。

与此同时,派遣留德学员成为普鲁士思想输入的重要环节。1898年张之洞奏请派遣学生“赴德肄业军事”,批准名单中包括陈兆鏞、刘冠三、郑士良等人^[2]。据陈兆鏞回忆录《德意志行记》载:“柏林之学,严如律令;凡军官学业,以分数为升降,不惟勇且智。”可见留学生将“教育即纪律”的理念视为德式军制的灵魂。

这种经验反哺回国后形成制度化力量。例如刘冠三回国后主持武备学堂“战术学科”,首次在教学中引入笔试、成绩等级与课程表。这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第一次具备现代学校教育的形式。

2.2 译著体系与课程本土化

知识教育化的关键,在于译介。普鲁士军事思想的系统引入,依赖于“德化教材”的翻译与改写。

《武学译丛》卷三中存在《战术学提要》《兵学纲领》《阵式初讲》等书,均由德籍教习与中方助教合作完成。其结构模仿普鲁士教材,但内容经由儒家语汇“再解释”。

译本不仅在语言上转化,更在结构上进行了“教育化”改写。例如原书第三章“野战地形测绘”在中文版本中被移入《测绘学纲要》独立授课;“军官与士兵关系”一节则改写为“上下有伦”。这些改动说明中国译者有意将制度知识嵌入既有的伦理秩序,从而降低文化冲突。

2.3 制度仿制与评估体系

军事教育的“制度化”在1905年达到高峰。湖北督练处颁布《军官教育章程》,首次提出“以学课为军政之本”,并规定各级军校应设五大科目:战术、测绘、兵制、操典、外语。其中四项与普鲁士陆军大学课程表完全对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评估体系的建立。1905年秋操时,湖北新军首度实行“成绩评比制”,评估项目包括:射击命中率、队列整齐、口令执行速度、夜行识别力等共八项指标。档案显示,第一营平均射击命中率为64%,被评为“良”;第二营命中率72%,评为“优”。

这种评比制度与普鲁士的“年度军操报告制度”(Jahresbericht der Truppenübungen)几乎相同。区别在于,普鲁士制度强调个人能力,中国则强调集体平均值。张之洞在《练兵札记》中评论道:“德法并举,务令队伍如一,勿偏重骁勇。”这体现了他将“纪律教育”理解为“整齐划一”的政治美学。

同时,学员成绩表的制度化也标志军事教育的量化进程。《武备学堂学员成绩表》(1906)将每科成绩以百分制记录,分为“优、良、中、次”四等。其评分标准包括射击、战术演习、理论笔试与德语口试四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军学成绩档案之一,显示出普鲁士教育制度的深远影响。

2.4 文化再语境化与“纪律的伦理化”

然而,普鲁士思想在中国并未完全保持原貌。其核心

理念“纪律(Disziplin)”在中国语境中被重新解释为“修身”或“服从上令”。

这种“伦理化转译”体现出知识迁移的文化再语境化特征。

在张之洞主持编撰的《学生须知》中明确规定:“日课必谨,衣冠必整,见长官以敬,应命以速。凡违者,训导之。”这种语言虽然形式上源于军事条令,但实质上延续了儒家“君臣一师生”关系的道德结构。

因此,普鲁士的纪律理性在中国转化为道德理性,军事训练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缩影。这种文化整合虽削弱了其专业主义内核,却在中国社会语境中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2.5 教育指标化与官僚化效应

普鲁士式教育制度的另一后果,是推动了清末军事教育的官僚化与绩效化。

据《湖北督练处呈报练兵月结表》记载,张之洞要求每月呈交“教学进度与成绩统计”,并派专员督察评分。此举既模仿德军“监学官(Inspektor)”制度,也暗合中国传统的“考课制”。

这种指标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教育与行政的结合。军校不再是武技训练场,而成为评核、晋升与奖惩的体系中心。

如一份1907年《武备学堂考核册》记述:“凡射击成优者,升上等;操典不精者,罚以延课。积劣三次者退学。”

这种“纪律—考核—淘汰”机制,使教育逐渐成为统治理性的组成部分。

2.6 制度移植的成效与张之洞的调整

普鲁士制度在湖北实施后,确实提升了部队的整体训练水平。1906年湖广秋操时,德方观察员报告:“编制完备,操演有法,其整齐度较三年前有显著进步。”然而,这一制度也遭遇“文化不适应”问题。张之洞在1907年奏折中承认:“德制固善,而士卒不解洋法,教官动辄呵斥,易生怨怼。”

因此,他逐渐调整教学方式,提出“以中文译本代德文教材,以中教辅外教”,并强调“以礼化武”。这一调整不仅缓解了冲突,也使普鲁士军事教育完成了中国化的最后一环:制度移植转变为文化融合。

3 思想转译:从“纪律”到“人格”的道德化重构

3.1 纪律的伦理化

在普鲁士军制下,纪律是“理性治理的工具”;在中国,它被诠释为“人格修养的体现”。湖北武备学堂的《兵士德行须知》明文规定:“凡士卒,必孝于父母、忠于君上、信于同袍。”这条训令显然并非出自普鲁士原典,而是典型的儒家三纲五常重构。

张之洞在《练兵札记》中写道:“德人尚法,我尚理;法可教军,理可化众。”^[3]他意识到纪律教育必须与传统伦理结合,才能在中国社会中立足。

这种结合催生出一一种“德式内容、儒式表达”的混合

体系：德籍教官讲授射击与战术，中方教官负责讲解忠孝与仁义。训练场上同时存在《步兵操典》的号令声与“忠君爱国”的训话，这种混搭正是中德知识体系交织的产物。

这种“纪律伦理化”并非削弱，而是强化了制度合法性。它使军人服从不再只是技术义务，而成为道德自觉。正如当时《大公报》评论所言：“湖北新军之整肃，非惟操练精良，实由德育并行。”^[4]

3.2 人格教育与职业化军官的诞生

普鲁士军事思想的另一关键在于军官职业化。其教育目标是塑造“有理性判断与独立责任感”的军官，即“人格教育”（*Bildung der Persönlichkeit*）。

这一理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以德养身、以才治军”。

湖北武备学堂的高级班学员需修《兵学概论》《军事伦理》两门课程^[5]。后者由德籍顾问梅克尔（*Jakob Meckel*）与法金汉的教材译编改写，内容包括军人品格、责任意识、决策原则等。

学堂档案记载，考试包括论文一篇，题目为“论军官之德与智孰重？”^[6]。多数学生回答“德为先”，理由是“德可感人，智可用人”。这表明，普鲁士式理性人格被重新阐释为儒家“君子人格”，职业伦理与传统道德在此交汇^[7]。

3.3 教育制度的延续与再生

普鲁士思想的影响并未止于张之洞一代。民国建立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在课程结构上完全继承了湖北武备学堂体系。其课程包括战术、测绘、外语与兵制学，授课用书仍为《战术学提要》《兵学纲领》等德译教材^[8]。

1920年代，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特别要求教官参考“德式教育之纲目”。廖仲恺在《黄埔军校教育大纲》中引用张之洞语录：“治军先教法度，以养忠勇。”^[9]这意味着普鲁士教育模式通过湖北传至广东，形成制度遗产链条。

同时，黄埔军校的“精神教育”亦承袭张之洞的“德育军事化”。蒋介石在1927年讲话中提到：“军人之德，乃建国之基。无纪律无信仰者，不足言强军。”这几乎是对普鲁士“*Disziplin und Glaube*”（纪律与信念）理念的直接移植。

3.4 知识转译与文化混成的特征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普鲁士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混成”（*Cultural Hybridity*）现象。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称的“第三空间”恰可用来描述这一过程：在中德知识的交叉地带，一种新型的教育语言与制度逻辑被生成。

这种“第三空间”的表现包括：

1. 德籍顾问教授军事技术，但教学过程被纳入儒家伦理体系；
2. 德文教材被翻译为中文后添加了道德教诲；
3. 军官培养制度吸收了科举式考核的逻辑。

这种双向转译既显示出清末官僚体系的弹性，也揭示了知识迁移的复杂性。正如法金汉在1899年的信中所言：“*Ich unterrichte Krieg, doch sie hören Moral.*”（译：“我教他们战争，而他们听成了道德。”）^[10]

他虽带着讽刺，却道出了事实——知识传播的意义不

在原貌保存，而在被重新理解。

3.5 制度理性与文化延宕

普鲁士军制的教育化还带来一种“制度延宕”（*temporal lag*）的现象。

清末引进的制度在民国和新中国继续以不同形式存在。例如，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的《陆军军官学校条例》仍采用“学科考核制”与“军官德行评分”，这些都源自湖北学堂的制度传统^[11]。

这种制度延续说明，普鲁士军事思想已深植中国的行政与教育结构中，其理性内核被本土政治伦理所吸纳。

4 结论：教育理性化的世界史意义

普鲁士军事思想的中国传播，是一场横跨制度、语言与文化的知识迁移运动。它通过顾问、译著与教育制度三条路径实现了“知识教育化”，并在中国语境中完成了道德化重构。

这一过程表明，外来制度的成功引入不取决于模仿程度，而在于其教育性转化能力。

当纪律被重新阐释为道德，教育成为治理的一部分，军制便不再只是军事问题，而成为文明形态的体现。

因此，普鲁士军事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改造了军队，更在于它催生了一种以教育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观念。

从湖北武备学堂到黄埔军校，从张之洞到蒋介石，这一思想谱系贯穿近代中国百年政治教育的主轴。它的核心，不是“德化”，而是“理性化”：即通过教育制度实现国家意志的自我复制。

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德式军学”不仅是一段历史现象，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理性化实验。它让我们看到，一个非西方社会如何在知识转译的复杂路径中，重新定义“教育”“纪律”与“国家”。

参考文献

- [1] Erich von Falkenhayn, *Dienst-Tagebuch in China* (1898–1901), Berlin: Mittler, 1903.
- [2] 《湖北武备学堂学生须知》，湖北省档案馆藏，1904年。
- [3] 张之洞：《练兵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4] 《大公报》，1903年10月12日，第4版。
- [5] 《湖广总督衙门档案·武备学堂课程表》，湖北省档案馆藏，1905年。
- [6] 《武备学堂考核册》，1906年，湖北省档案馆藏。
- [7] 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Late Qing China*, Brill, 2008, p. 217.
- [8] John Schrecker, *The Chinese Army, 1860–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45–153.
- [9] 廖仲恺：《黄埔军校教育大纲》，1924年，中央档案馆藏。
- [10] Falkenhayn Erich von, *Letter to General von Schlieffen*, 1899, Bundesarchiv Berlin.
- [11] 王奇生：《制度理性与军事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